

从上海看中国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趋势

——兼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适用性

陈 蓉

【摘 要】终身未育者增多是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突出的新变化,已有研究大多认为中国仍是“普育”社会,并将其视为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独特之处。文章以中国上海市为例,从代际差异、婚姻状况、社会经济特征3个维度,使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及相关婚育调查数据,考察女性终身未育现象的变化趋势,并以此为切入口浅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表明,就已度过育龄期和处于育龄末期的女性而言,上海市女性终身未育水平仍低于欧洲国家和同处儒家文化圈的东亚社会;但相对年轻的“65后”“70后”女性与年长队列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终身未育水平上升趋势。越是年轻的女性队列,终身未婚对终身未育的贡献越大;非上海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低于上海户籍女性,但年轻队列中前者明显向后者靠拢。女性终身未育率还表现出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升高的特征。当前仍处于育龄期的年轻队列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队列,且婚育观念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和个体性,婚育意愿低迷,推迟婚育的人群规模也在扩大,这些迹象预示着年轻队列的终身未育水平可能进一步上升。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现象及其扩散趋势,或许预示着当前中国社会的“普育”现象是“过渡性”的而非“独特性”特征。

【关键词】终身未育;第二次人口转变;人口普查;上海

【作者简介】陈蓉,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中心暨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中国人口科学》(京),2023.3.68~8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大城市居民婚姻行为的新特征、成因、影响及趋势研究”(编号:19CRK017)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于20世纪90年代初已降至更替水平之下,标志着中国完成了经典人口转变,迈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3。顺应人口变动新形势,探索低生育率下人口变动的规律及其应对措施,无疑是21世纪人口研究的重大历史使命。

从全球范围看,欧洲是最早完成经典人口转变的地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欧洲国家在经历短暂的婴儿潮后,生育率快速降到更替水平并继续下滑,这一现象无法沿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予以解

释。在此背景下,欧洲学者 van de Kaa 等于1986年首次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逐步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该理论归纳了低生育率下婚育观念和行不同于高生育率时代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和特征,继而探究生育率到达更替水平后继续下降的原因,并预判完成经典人口转变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人口特征及个体婚育行为的变化趋势(Lesthaeghe, 2014)。

中国学者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关注从21世纪初开始(蒋末文,2002;刘爽等,2012;石人炳,2012;吴帆、林川,2013;於嘉、谢宇,2019;Yu等,2022;Gu,2022;顾宝昌,2023)。於嘉和谢宇(2019)、

Yu 等(2022)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与欧洲相比具有一系列独有特征:例如,尽管婚育推迟趋势明显,但中国仍是“普婚普育”的社会,与欧洲国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终身不育比例上升的趋势明显不同;再如,尽管在中国社会也观察到了同居行为日益普遍,但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同居行为仍是婚姻的前奏而非替代,非婚生育也非常少见(类似的结论另见 Gu, 2022)。这是否意味着存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中国模式”,非常值得探讨(Gu, 2022)。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相对于欧洲国家而言,中国完成经典人口转变的时间较晚,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或许尚未充分展开,当前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究竟意味着“独特性”还是“过渡性”,这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才能做出准确判断(Gu, 2022)。其次,於嘉和谢宇的研究考察的是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的整体发展趋势。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国内各地区、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巨大,地区文化复杂多元,经典人口转变的起止时间不同、经历过程差异较大,各地目前的生育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正如第二次人口转变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者之一 Lesthaeghe 所指出的,由于中国规模太大,第二次人口转变可能会在某些人群中首先呈现(Lesthaeghe, 2010),於嘉和谢宇也强调开展不同子群体研究的必要性(於嘉、谢宇, 2019)。因此,在全国整体趋势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开展典型地区的研究,以检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以及低生育率下中国人口的变动规律。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人口转变、价值观念转变,上海都在全国起先导作用。早在 1971 年上海就已经完成了生育转变,比全国整体生育转变进程早很多(陈蓉、顾宝昌, 2020)。在上海人口转变接近尾声时,中西部内地省份生育转变进程大多还处于初始阶段。自 1994 年以来,上海持续近 30 年的调查总和生育率处于 1 以下的极低水平(陈蓉、顾宝昌, 2021),近几年甚至已低至 0.7。1993 年开始上海进入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阶段,是全国第一个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的地区(顾宝昌, 1994)。综合以上事实,上海是研究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趋向的重要案例。

终身未育者的占比上升,是西方国家第二次人

口转变不同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一个突出的特征(Lesthaeghe, 2014),也是考察是否存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维度。不仅如此,终身未育者增多会进一步拉低生育水平,这已成为东亚社会极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原因(Sobotka, 2021)。

鉴于此,本文拟以上海为例,探讨中国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现象的变化趋势,并以此为切入点,考察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尽管上海并不能代表当前全国整体的情况,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考察上海女性终身未育的现状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对于中国大城市不失其典型性意义,对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前瞻性借鉴意义,对判断全国未来趋势具有重要启示。

二、文献综述

对欧洲国家和部分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低生育率研究大多观察到女性终身未育水平升高的趋势。近几十年来,欧洲社会对无子女现象的接受度有所提高(Merz 等, 2012),在德国、瑞士、奥地利、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处于育龄末期的女性无子女的比例均不低于 20%(Sobotka, 2017; Fiori 等 2017)。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女性终身无子女的比例为 4%~12%,而 70 年代出生的女性终身无子女率已上升到同一时期的全球最高水平: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香港相应比例在 30% 左右,韩国和中国台湾约为 20%,且这些地区的终身无子女率仍呈持续升高趋势(Sobotka, 2021)。国外学者对女性终身未育的影响因素及终身未育者的特征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发现出生队列、婚姻经历、生活地区、移民经历、职业类型、受教育程度等诸多因素均会对女性终身未育水平产生影响(London 等, 2017; Chaloupková 等, 2020);未婚、受教育程度高、居住在城市、原生家庭规模较小的女性自愿不育率相对较高(Chancey 等, 2009)。

中国学者对生育转变及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研究很多,但对于终身未育的研究目前还相对较少(於嘉, 2022),这一研究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可开发的数据。例如,尽管在全国人口普查和 1% 人口抽样调查(以下简称“小普查”)中询问了妇女的曾生和存活子女数,但在公开出版的资料里仅有简要

的汇总数据,难以满足深入分析需求。再者,国内开展了大量的生育调查,但多数是面向育龄人群,对已度过育龄期人群的生育史调查相对缺乏,且抽样调查的结果往往会受样本代表性的制约。已有的研究由于采用的数据不同,考察的视角不同,得出的具体终身未育水平估计结果也存在差异。例如,翟振武和刘雯莉(2020)的研究显示,根据2015年“小普查”的结果,中国40岁妇女中无活产子女的比例为6.07%,49岁、50岁妇女中相应比例分别为4.16%和4.55%,而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40~60岁妇女中未曾生育者占0.67%~3.22%,明显低于2015年小普查的结果。

尽管不同研究估计的具体水平存在差异,但已有研究大多认为,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已度过育龄期的女性终身未育率一直处于极低水平,绝大多数女性至少会生育1个孩子(陈卫、段媛媛,2019);在已婚女性中,终身未育率更低,“丁克”只是少数中国人的生育理想(张亮,2012)。於嘉和谢宇(2019)基于1982~2015年历次普查和“小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1949年及以前、1950~1959年和1960~1969年出生队列中,已婚女性的终身未育比例持续保持在1%左右。专项社会调查数据也表明,中国女性终身未育率极低。例如,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2018年已基本度过生育期的(1970年以前出生)女性中,终身未育比例不到2%，“70后”已婚女性婚内不育的比例仅为1%(於嘉,2022);根据2006年和2008年两次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1965年之前出生队列中的已婚女性无子女率均在1%以内,1965~1969年出生队列中已婚女性无子女率也不到2%(张亮,2012)。据此,已有研究大多认为,中国仍属于“普婚普育”的社会(於嘉、谢宇,2019;翟振武、刘雯莉,2020;於嘉,2022),终身不育者大幅上升的现象目前在中国并未出现(於嘉,2022)。

笔者认为,一方面,已有研究对终身未育率的估计或测算大多是基于2015年“小普查”或更早的数据,相应结果应当使用2020年“七普”数据进行交叉检验和更新。另一方面,对于已度过生育期的女性而言,其终身未育率仅能反映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不能反映当下和未来处于生育

适龄期的女性终身生育行为的变化趋势,后者代表着影响中国未来生育水平的重点人群及其生育行为特征。对当前较年轻队列的生育行为进行跟踪研究和趋势预判,有助于及时对生育变动提供预警,避免错失政策干预的有利时机。终身未育现象的研究有水平研究和趋势研究两个视角,后者更能反映终身未育的变化趋势,更能预判未来的走向。

鉴于此,本文主要基于2020年“七普”汇总数据,以上海为例,从出生队列、婚姻状态、社会经济特征(反映在不同受教育程度与户籍特征)3个维度,研究中国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的现状特征及未来趋势,着重探析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在度过育龄期或处于育龄末期时的无子女率及队列变动状况,探究不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籍特征的人群异质性,并据此预判年轻队列女性终身未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展开讨论。

三、概念界定及数据来源

终身未育不同于终身不育,前者是指终身未发生生育行为,而后者通常会与不能生育联系起来。本文使用人口普查数据而非医学、生物学数据,故文中采用“终身未育”指代女性在度过生育期时未曾生育子女的情况。具体来说,本文使用“七普”长表中女性生育史的调查数据,即“C26.15~64岁(1955年11月1日至2005年10月31日出生)的妇女生育子女数”,未生育者的曾生子女数为0,本文将无子女率定义为曾生0个孩子的女性占比^①。对处于育龄末期和已度过育龄期的女性分析其无子女率,可以反映过去几十年中国女性终身未育现象的变动状况;而对适育年龄女性分析其无子女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生育推迟的程度,借以预判其终身未育的变化趋势。

人口统计学中一般将妇女育龄阶段的上限年龄界定为49岁,从现实中观察到的女性生育模式来看,40岁及以上初次生育的可能性很低。根据2020年“七普”长表汇总数据,普查时点前一年(即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上海市15~49岁常住育龄妇女的一孩生育中,97.87%发生在40岁以前,仅有2.13%发生在40~49岁之间;而43~49岁生育的比例仅0.71%。可见,从目前上海市的

情况看,女性在42岁以上生育一孩的比例不足1%,因此,可以将估计终身未育率的年龄下移至42岁甚至40岁。事实上,一些已有关于无子女的研究中,常以42岁或42岁及以上女性的无子女率作为终身未育率的估计(张翠玲等,2023)。为此,本文将综合上述不同界定标准,分别报告42岁、49岁和50岁及以上女性的无子女率。在对终身未育变化趋势的分析中,研究对象限定为40岁及以上女性,以便为近期终身未育率的变化提供预警。基于2020年上海市40~64岁女性的生育史数据,可以回溯1956~1980年女性出生队列的终身未育率变化轨迹^②。

此外,上海市1995和2015年“小普查”汇编资料中分别公布了15~64岁、15~50岁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分布情况^③。结合这两次“小普查”以及2020年“七普”数据,可以计算各年龄组女性的无子女率,进而考察无子女率的纵向变动趋势,并讨论育龄期年轻女性推迟生育的情况。

最后,本文还使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1年10月开展的“三孩政策背景下上海市育龄妇女生育状况和生育意愿问卷调查”数据,考察20~39岁育龄女性的生育打算,作为预判年轻队列未来终身生育行为的参照。该调查的目标对象为20~49岁在沪常住育龄妇女,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PPS抽样方法,覆盖了上海市所有的居村委。该调查收集的有效样本量为19314人,其中,未婚女性占26.5%,已婚有配偶女性占68.2%;样本中年龄在20~24岁、25~29岁、30~34岁以及35~39岁的女性占比依次为8.9%、17.2%、21.7%和22.1%。

四、女性终身未育率的变化趋势

(一)上海女性终身未育水平呈明显升高之势

从已度过育龄期和处于育龄期末的女性无子女率来判断其终身未育水平,“七普”数据显示,上海市常住女性中,42岁女性的无子女率为10.01%,其中,本地户籍女性和外来常住女性无子女率分别为11.95%和7.03%;49岁女性无子女率为5.11%,户籍和外来常住女性无子女率分别为6.90%和3.20%;50~64岁常住女性无子女率为2.78%,其中户籍和外来常住女性无子女率分别为3.32%和1.51%。这些数值显示,目前,上海市女性终身未育水平仍远低于欧洲国家和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

坡,也低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

从终身未育的变化趋势来看,首先,“七普”数据显示,上海市常住女性人口中,1956~1965年出生队列的终身未育水平变化幅度不大,基本保持在2.5%左右;但1966年之后的出生队列终身未育水平提升趋势明显,已从1965年出生队列的2.41%提升至1970年出生队列的4.36%和1980年出生队列的11.32%(见图1)。其次,已婚女性的终身未育率曲线变化的转折点也对应于1965年出生队列。在已婚女性中,1956~1965年出生队列的终身未育水平基本保持在1.5%~2.0%之间,但此后的出生队列中相应比例提升趋势十分明显,从1965年的1.66%提升至1970年的2.89%和1980年的5.43%(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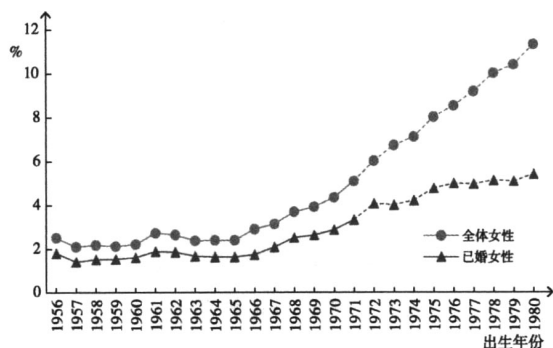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市1956~1980年出生队列全体及已婚女性的终身未育率

数据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上海市数据。

综上所述,尽管与欧洲国家及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上海市已度过育龄期和处于育龄末期的女性终身未育水平仍相对较低,但1966年及之后的出生队列中终身未育水平上升趋势十分明显。终身未育女性增多的趋势在中国的典型大城市上海已经出现,并表现出年轻队列比年长队列更为明显的变化趋势。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从后现代化的视角,揭示了欧洲国家在社会结构变迁、文化嬗变和技术革新的共同作用下,婚姻、家庭和生育模式的重新建构,进而引发婚育行为发生新的变化(Lesthaeghe, 2014)。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65后”尤其是“70后”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与年长队列相比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婚育观念和行为方式也随之改变。

(二) 终身未婚对终身未育的贡献在年轻队列中
不断增大

从图1可以看出,各队列已婚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均低于全体女性,1956-1965年出生队列中全体女性与已婚女性的终身未育率曲线变化形态基本一致,但1966-1980年出生队列中已婚女性的曲线斜率明显小于全体女性,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尤其是1972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中相应差距更大(见图1)。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和实践中,缔结婚姻仍是生育孩子的前提。由此不难理解,已婚女性与全体女性的终身未育率的差距主要是由不断上升的终身未婚现象带来的。

表1对比了各队列女性中总体未婚比例与无子女人群的未婚比例。从表1可以看出,1956-1980年出生队列的无子女女性中,未婚比例合计为41.56%;分出生队列来看,越是年轻的队列,未婚比例越高:1976-1980年出生队列的无子女女性未婚比例高达50.82%,比1956-1960年出生队列高近22个百分点。可见,终身未育与终身未婚^④之间的关系密切,且越是年轻的队列,终身未婚对终身未育的贡献越大。图2显示,1956-1980年出生队列中终身未婚率和终身未育率呈同步走高趋势。

(三) 上海市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高于非上海户籍女性

“七普”数据显示,上海市常住人口中上海户籍人口占57.86%,非上海户籍人口占42.14%。鉴于特大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的社会经

表1 1956-1980年出生队列中无子女女性
与全体女性的未婚比例 单位: %

出生队列	全体女性 未婚比例	无子女女性 未婚比例
1956-1960年	0.64	28.85
1961-1965年	0.76	30.51
1966-1970年	1.27	34.63
1971-1975年	2.59	39.49
1976-1980年	5.05	50.82
合计	2.08	41.56

数据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上海市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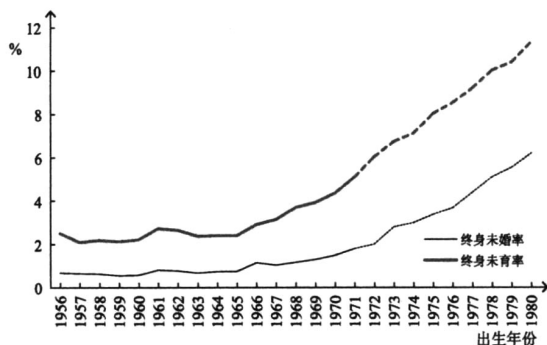


图2 上海市1956-1980年出生队列的
终身未育率与终身未婚率

数据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上海市数据。

济特征差异明显,有必要分别考察两个群体中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及变动状况。

图3对比展示了1956-1980年出生队列中户籍女性和非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率。由图3可见,1956-1965年出生队列的户籍女性终身未育水平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左右;但1966-1980年出生队列的终身未育水平提升趋势明显,在1970、1975和1980年出生队列中该比例分别为5.73%、11.09%和12.96%。可见,“65后”和“70后”的户籍女性终身未育行为与年长队列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终身未育比例随队列快速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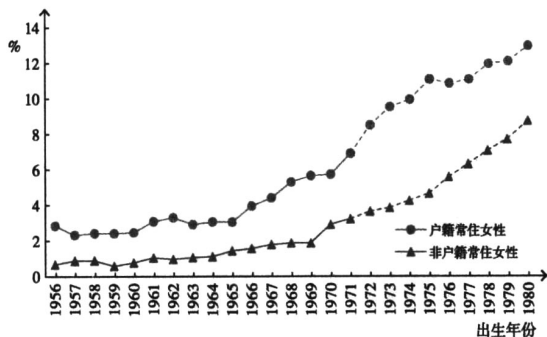


图3 上海市1956-1980年出生队列的
户籍与非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率

数据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上海市数据。

在非户籍女性中,终身未育率曲线变化的转折点大致对应于1969年出生队列。1969年以前出生的非户籍女性终身未育水平呈小幅提高态势,由1956年出生队列的0.65%小幅上升到1969年出生队列的1.84%。但1969年以后出生队列的非户籍女性

终身未育水平明显上升,由 1970 年队列的 2.88% 快速提升至 1975 年队列的 4.64% 和 1980 年出生队列的 8.72% (见图 3)。

尽管非上海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行为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的时间点要晚于上海户籍女性,各出生队列终身未育水平也明显低于上海户籍女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户籍女性还是非户籍女性,年轻队列的终身未育水平持续上升。从图 3 可以看出,非上海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行为在向上海本地户籍女性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市女性终身未育现象逐渐增多的趋势未来可能向其他城市乃至全国扩散。事实上,全国范围也已经观察到女性终身未育水平上升的趋势,根据张翠玲等(2023)的计算,2010 年全国 49 岁女性无子女率为 1.29%,至 2020 年已升高到 5.16%。

(四)终身未育率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升高

在女性终身未育的影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最

受关注。众多研究发现,终身无子女率随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而升高(Hara,2008),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低学历女性更可能不生育子女(Raymo 等,2015; Cheng,2020),这也被认为是导致东亚社会近年来终身不育率上升的核心因素之一(Sobotka,2021)。表 2 基于“七普”数据展示了上海市 1956-1980 年出生队列的女性分受教育程度的无子女率,从中可以看出,各出生队列均呈现出无子女率随教育程度提高而升高的差异模式。

五、年轻队列女性终身未育率的变化趋势探讨

(一)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或将是推高年轻队列终身未育率的重要因素

上文的分析表明,已度过育龄期和处于育龄末期的女性中,终身未育率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升高。目前正处于育龄期的年轻女性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队列,且越年轻的队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越高^⑤(见图 4),这可能意味着年轻队列在度过生育期时终身未育的比例会高于年长队列。

表 2 上海市 1956-1980 年出生队列各教育程度女性的无子女率 单位: %

出生队列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及以上
1956-1960 年	1.39	1.78	2.42	4.16	5.45
1961-1965 年	1.48	1.36	3.30	4.23	5.94
1966-1970 年	1.38	1.79	5.79	8.27	9.00
1971-1975 年	2.27	2.90	8.57	11.61	13.72
1976-1980 年	4.37	4.25	9.85	12.84	14.65
合计	1.85	2.33	4.86	9.64	12.47

数据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上海市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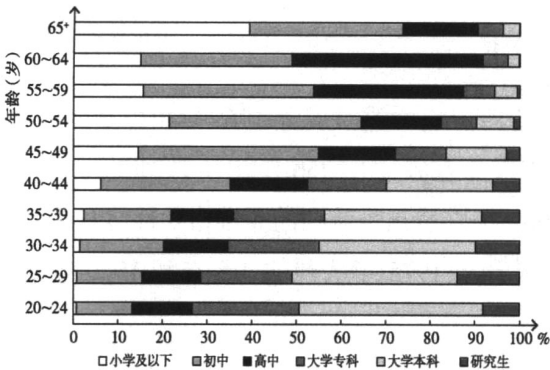


图 4 “七普”时不同队列的上海女性的受教育程度

数据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上海市数据。

成家和立业自古即是中国人生命历程中的两件大事,结婚生子是为“成家”,“三十而立”所言正是立业。在传统社会中,这些生命事件的序次是先成家、后立业。但当前多数年轻人认同必先“立业”,“成家”才能有保障;在人生追求中,事业发展已经优先于结婚生子。通过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竞争力,往往被认为是更好地“立业”的最有效途径,在东亚社会尤为如此。

(二)年轻队列婚育推迟趋势可能继续拉高终身未育率

在中国社会,婚内生育仍是主流,非婚生育尚不多见。因此,结婚年龄的不断推迟势必导致初育时

间的延后,甚至有可能错过最佳生育年龄,以致终身不育。“五普”“六普”和“七普”数据显示,近20年来,无论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从全国范围看,20~40岁人口婚姻推迟的现象普遍存在。相较而言,上海市年轻队列的晚婚趋势更明显(陈蓉,2023)。“五普”时,上海市30岁女性中仅有4.81%处于未婚状态,35岁女性中仅有1.51%的人尚未结婚;到“七普”时,30岁女性中有高达27.05%的人尚未结婚,即使是35岁女性中也仍有12.45%的人尚未初婚(陈蓉,2023)。

上海市年轻人不仅越来越倾向于晚结婚甚至不结婚,而且即便结婚也不一定生育。2019年底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的监测数据显示,夫妻双方均为初婚的人群中,结婚五年后有近1/3的夫妇没有生育(陈蓉、顾宝昌,2021)。图5展示了1995年和2015年“小普查”、2020年“七普”数据中女性分年龄组的无子女率。从中可以看出,过去20多年,上海市15~49岁女性推迟生育的趋势非常明显:1995年的调查数据中30~34岁女性未曾生育的比例仅5.95%,此后年龄组变动很小。2015年30~34岁女性的无子女率高达24.29%;2020年更高,为31.12%,同年即使是35~39岁女性仍有16.34%未曾生育。

当前年轻队列推迟结婚和生育的趋势凸显,势必会提高女性的终身未育概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才考虑结婚生育,包括完成高等教育、获得体面的工作和收入等;某种程度上这是负责任的、理性的人生规划,但由于孕育子女被安排在其他生命事件之后,增加了最终没能如愿实现生育目标的风险。

(三)年轻女性婚育意愿低迷预示着终身未育率存在进一步提升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化,面对快速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人们的婚育观念也相应发生变化,年轻人的婚育观转变更多地体现了现代性和个体性。婚育观念是影响婚姻和生育行为的内生动力,是推动婚育行为发生变化的直接因素,对于预判婚育行为的变动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三孩政策背景下上海市育龄妇女生育状况和

生育意愿问卷调查”数据显示,20~39岁女性受访者中不打算生育的占18.69%,总体上反映出年轻女性生育意愿低迷的现实。在不打算生育的女性中,未婚未育者占90.99%,压倒性地多于已婚未育者(9.01%),这进一步印证了前文讨论的晚婚和不婚现象对终身未育的突出贡献。

综上所述,年轻队列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上升,婚育意愿低迷,推迟结婚甚至终身不婚、推迟生育的趋势明显,这些因素都有可能进一步推高上海市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理论框架,对于预判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大城市在完成经典人口转变后婚育变动趋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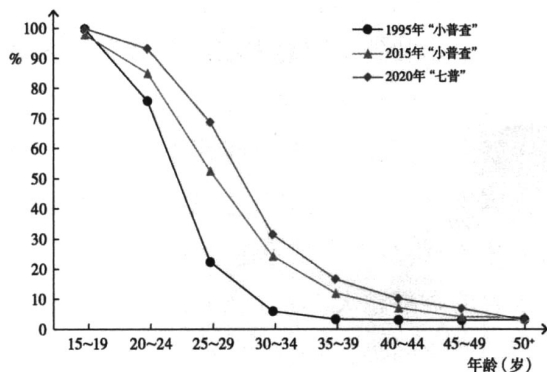


图5 1995、2015年“小普查”和“七普”

上海女性分年龄的无子女率

注:数据分别来自1995、2015年“小普查”和2020年“七普”;最后一个年龄组50+,1995和2020年是指50~64岁女性,2015年仅包括50岁女性。

六、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为例,综合使用2020年“七普”、1995年和2015年“小普查”及相关婚育调查的数据,从出生队列、婚姻状况、社会经济特征3个维度分析了已度过育龄期和处于育龄末期的上海女性终身未育的特征,并对年轻队列的终身未育可能性进行了前瞻性探讨。

就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期的女性而言,其终身未育水平低于欧洲国家和与上海同处儒家文化圈的东亚社会不少地区,但其中相对年轻的队列与年长队列相比,终身未育现象已表

现出明显的升高趋势。越年轻的女性队列,终身未婚对终身未育的贡献越大。非上海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低于上海户籍女性,但二者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甚至在最年轻队列中呈现一定的收敛。

终身未育率还表现出随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升高的特征。当前仍处于育龄期的“80后”“90后”等年轻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队列,而且婚育观念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和个体性,结婚和生育的意愿低迷,实际推迟结婚、推迟生育的人群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些因素都预示着未来年轻队列的终身未育水平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综上所述,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所揭示的终身未育现象上升的趋势在中国社会已初露端倪。正如欧洲各国观察到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陆续出现一样,终身未育者增多也可能首先在以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城市显现,进而向其他地区扩散。年轻队列在追求个体价值过程中可能主动放弃或被动错过生育机会,最终导致终身未育现象增多,甚至“普婚普育”的婚育范式有可能被替代。

第二次人口转变还反映在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中(Lesthaeghe, 2014)。新的行为从出现到扩散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即能够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获益、在文化上可接受、在技术或法律上可实行,三者缺一或者有一个滞后均会延缓扩散进程(Lesthaeghe, 2022)。对终身不生育这一非传统生育现象,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轻人在观念上已经能够接受,放弃生儿育女可能使人们在其他生命历程事件上获益,同时避孕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使其易于实现。因而,终身未育现象在中国大城市的年轻、高学历人群中已经凸显,并呈扩散趋势。考虑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完成经典人口转变的时间晚于上海,目前上海市女性终身未育现象的变化趋势在未来可能向其他城市和地区扩散。

(二) 研究不足及展望

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终身未育的最终结果是由两类原因造成的。第一类是一贯式的,其中又包括主观上始终无生育意愿、即自愿的终身不育(voluntary childlessness)和客观上无生殖能力的非自愿终身不育(involutary childlessness)。第二类是渐进式的,主观上并非不想要孩子,生理上也有生育能

力,但由于生命历程中竞争性因素的影响错失合适的生育机会,最终导致终身未育。因此,终身未育现象是无生育意愿、无生殖能力和无生育机会的总和(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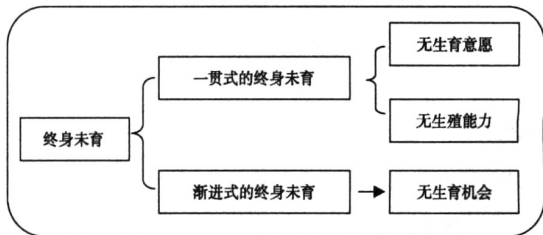


图6 形成终身未育结局的示意图

现代社会中,终身未育行为的渐进变化值得关注。生育孩子与接受教育、缔结婚姻、发展事业这些重要的生命历程事件之间存在着“先后次序”,如果人们倾向于将生育孩子排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那么生育计划就有可能被其他事件干扰或中断,最终无法实现。本文的研究只揭示了作为结果的终身未育率变化趋势,其中有多少是主观上不想生育引起的、多少是客观上不能生育导致的、多少是因为推迟婚育而耽误或错过的,这些问题还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对于有生育意愿但因客观生理性因素导致的不能生育的人群,需要加强生殖辅助方面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对于有生育意愿但因其他生命事件耽搁而错过了生育机会的人群,应通过构建完善的社会和家庭政策,给年轻人创造友好的生育环境,帮助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更好地兼顾事业发展和家庭生育养育;对于主观上不想生的人群,可以尝试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家庭的意义和为人父母的价值,适当予以宣传倡导。多管齐下,以期延缓年轻人单身和终身未育率的上升趋势。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的分析还相对粗浅,未来需要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分析大城市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人群婚育观念和终身未育行为的差异与变化,并与国内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进行比较,以期更全面地释答终身未育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更好地探索低生育率社会的人口规律及其应对策略。此外,由于中国整体上进入低生育率的历史相对较短,加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第二次人口转

变的特征或许尚未充分展开,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Gu,2022;顾宝昌,2023)。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该题仅询问有婚史的女性,未考虑未婚女性的生育行为。所以本文基于此题计算全部女性的终身未育率可能会略有高估。

②虽然40~49岁女性生育较为少见,但以其当前的无子女率作为终身未育率可能会略有高估。因而,在后文所绘制的趋势图中,将2020年相应年龄女性(对应1971~1980年出生队列)的终身无子女率使用虚线,以区别于实际度过育龄期的女性。

③2000年“五普”、2005年小普查和2010年“六普”汇编资料里没有相关数据。

④人口学一般将50岁时仍未结婚者视为终身不婚。此处为了对比终身未育趋势,本文将未满50岁的(1971~1980年)出生队列在40岁及以上未婚近似视为终身未婚,在图2中使用虚线表示。

⑤20~24岁女性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的占比低于25~29岁组,主要是因为尚未完成研究生教育。

参考文献:

- [1]陈蓉(2023):《我国大城市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趋势及其影响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
- [2]陈蓉、顾宝昌(2020):《实际生育二孩人群分析——基于上海市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3]陈蓉、顾宝昌(2021):《低生育率社会的人口变动规律及其应对——以上海地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为例》,《探索与争鸣》,第7期。
- [4]陈卫、段媛媛(2019):《中国近10年来的生育水平与趋势》,《人口研究》,第1期。
- [5]顾宝昌(1994):《从上海看人口负增长》,《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6]顾宝昌(2023):《为什么要关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兼论对人口变动规律性的探索》,《现代管理丛刊》,第一辑。
- [7]蒋未文(2002):《“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其思考》,《人口研究》,第3期。
- [8]李文珍(2020):《1957年以来出生女性群体的婚孕新趋势——以未婚怀孕为中心的分析》,《人口学刊》,第6期。

[9]刘爽等(2012):《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人口研究》,第1期。

[10]石人炳(2012):《人口转变:一个可以无限拓展的概念?》,《人口研究》,第2期。

[11]王金营等(2019):《中国生育水平、生育意愿的再认识:现实和未来——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北方七省市的数据》,《人口研究》,第2期。

[12]吴帆、林川(2013):《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13]於嘉(2022):《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14]於嘉、谢宇(2019):《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人口研究》,第5期。

[15]翟振武、刘雯莉(2020):《中国妇女终身不孕水平究竟有多高?——基于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16]张翠玲等(2023):《中国女性终身不育水平估计——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第3期。

[17]张亮(2012):《“丁克”家庭:青年人的时尚?——一项国际比较研究》,《青年研究》,第5期。

[18]Chaloupková J. K., Hasková H. (2020), The Diversity of Pathways to Childlessness in the Czech Republic: The Union Histories of Childless Men and Women.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46: 100363.

[19]Chancey L., Dumais S. A. (2009),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in Marriage and Family Textbooks, 1950–2000. *Journal of Family Story*. 34(2): 206–223.

[20]Cheng Y. H. A. (2020), Ultra-low Fertility in East Asia: Confucia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8: 83–120.

[21]Fiori F., Rinesi F., Graham E. (2017), Choosing to Remain Childl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among Women and Men in Italy and Brita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3: 319–350.

[22]Gu B. (2022), Applicabilit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Asia.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6: 223–227.

[23]Hara T. (2008), Increasing Childlessness in Germany and Japan: Toward a Childless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17(1): 42–46.

[24]Lesthaeghe R. J. (2010),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2): 211–251.

[25]Lesthaeghe R. J. (2014),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Concise Overview of Its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1(51): 18112-18115.

[26] Lesthaeghe R. J. (2022),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lso a 21st Century Asian Challenge?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6: 228-236.

[27] London A. S., Elman C. (2017), Race, Remarital Status, and Infertility in 1910: More Evidence of Multiple Causes. Demography. 54(5): 1949-1972.

[28] Merz E. M., Liefbroer A. C. (2012), The Attitude toward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in Europ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 587-600.

[29] Raymo J. M., Park H., Xie Y., Yeung W. J. 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30] Sobotka T. (2017), Childlessness in Europe: Reconstructing Long-Term Trends among Women Born in 1900-1972. In: Kreyenfeld, M., Konietzka, D. (eds) Childlessness in Europe: Contex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Cham: Springer.

[31] Sobotka T. (2021), World's Highest Childlessness Levels in East Asia. Population & Societies. 595(11): 1-4.

[32] Yu J., Xie Y. (2022), Is There a Chinese Pattern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6: 237-266.

The Trend of Childlessness in Shanghai: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Chen Rong

Abstract: The increase of childlessness is one of the salient new changes observed d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urope. However, many studies suggest that China is still a "universal childbearing" society, which is also regarded as one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aking Shanghai, the largest city in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rend of women's childlessness by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marital status,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in 2020, two mini-censuses in 1995 and 2015, and one relevant survey.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in China.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childless rates of the cohorts that have passed or are at the end of child bearing ages in Shanghai are still lower than those in European countries or in some East Asian societies, however, the relatively younger cohorts, born since 1965 or 1970 in particular, have observ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in childless rates. The younger the cohort, the greater the contribution of lifetime singlehood to lifetime childlessness. The lifetime childless level of women without Shanghai hukou is lower than that of women with Shanghai hukou. And the lifetime childless level also shows a substantial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educational level. For the younger cohorts who are still at childbearing ages, their educ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lder cohorts, their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are more modern and individualistic, their willingness to marry and have children is weaker, and the number of women who actually delay marriage and child bearing is also enlarging, which might predict that the lifetime childless level of the younger cohorts will further rise. In large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the lifetime childlessness has shown an increasing trend, which may indicat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of "universal childbearing" observed in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is more likely to be "transitional" rather than "distinctive".

Key words: childlessness;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census; Shanghai